

两方金印确定身份,张昭墓在江苏南京被发现

内事不决就要问他,凭啥?

□王小丫

原来你也在这里

张昭身份的确认是凭借墓内出土两方龟纽金印,上有“辅吴将军章”和“娄侯之印”字样。在《三国志·吴书·张昭传》中,有一句:“更拜辅吴将军,班亚三司,改封娄侯,食邑万户。”

这是文字记载的张昭职务与封号,正是这两枚金印、墓葬形制结构,让后人得以查知墓主人的身份。

这或许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——跨越千年的文、物得到互证。一个在油墨文献中笔笔传抄传至今,一个则在厚土隐墓中拨开尘雾重见天日。它们承载着同样的文字,以不同的形式将历史封存起来。它们如果也有意识,或许会相视一笑:啊,原来你也在这里。

与此同时,张昭的“梗”也开始被重新玩了起来。很多人印象中的张昭,或是赤壁战前力主投降的“江东鼠辈”,或是三国杀中手里有一堆基本牌的武将,也是《三国演义》中孙策托孤时所说的“内事不决问张昭”的政治家。作为东吴政权的“创始员工”,张昭在孙策时代便随征天下,见证了东吴政权的建立与兴废,是三国文化中名垂千古的人物。

凭啥内事要问他?

虽然“内事不决问张昭,外事不决问周瑜”只是罗贯中的杜撰,但这也是根据史料进行的合理改编,有一定依据:

“五年,策薨,权统事。瑜将兵赴丧,遂留吴,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。”(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)

这则史料就说明,孙策去世后,正是周瑜与张昭主事。而且张昭也确实重要的“托孤老臣”(策临亡,以弟权托昭,昭率群僚立而辅之)。

为什么当时年轻的张昭也称上了“老臣”?只因孙坚、孙策这两位草创者实在短命,导致那时的江东连“三朝元老”也并不少见,如程普、韩当等。

所以,虽然孙权是三足鼎立中东吴一方的主政者,但他的年龄远远小于曹操、刘备。而就在作为“小辈儿”的孙权尚未立威的赤壁之战前夕,孙吴是战还是降?周瑜和张昭两位“主事”的态度就显得格外关键。

他为何主张投降?

曹操先发来一封充满了威胁意味的函件:“今治水军八十万众,方与将军会猎于吴。”

孙权将曹操的话转述众人,众人“莫不响震失色”。

这也是使张昭“晚节不保”的投降决策出现的历史背景。

对此,张昭表示:“曹公,豺虎也,挟天子以征四方,动以朝廷为辞;今日拒之,事更不顺。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,长江也;今操得荊州,奄有其地,刘表治水军,蒙冲斗

公元236年,三国时期的股肱之臣张昭去世,长眠在当时叫建邺的东吴都城。公元2024年,一则新闻宣告张昭家族墓在江苏南京被发现。熟读三国的读者肯定对张昭不陌生。尽管知名度并不等于美誉度,但一句“内事不决问张昭”无疑让张昭“咖位”增加不少。那么,张昭墓是如何被确认的?你对真实的张昭又了解多少?



张昭墓地出土的龟纽金印。



龟纽金印文字。

舰乃以千数,操悉浮以沿江,兼有步兵,水陆俱下,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,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。愚谓大计不如迎之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五·汉纪五十七·孝献皇帝》)

大概意思就是说,曹操实在强大,而我们太过弱小,不如投降。

他为什么要这么说?是源于恐惧,还是另有考虑?要理解这个决策,首先要跳出我们的“后人视角”。

建安七年(202年),曹操在官渡赢了家世、军力都远胜于己的袁绍。建安十二年(207年),又征乌桓,统一了北方,势如破竹,遂预备拥军南下。张昭的恐惧或即来源于此,所谓“三足鼎立”容易使人误解魏蜀吴三方的国力分庭抗礼,但事实上,北方朝廷倚仗数百年的政治积累,无论人才、制度、军备乃至文化都远远领先于吴、蜀。不得不说,吴、蜀是借秦岭之固,三江之阻的地利,加之姻亲等关系联盟,才能与强魏实现南北对峙:“吴、蜀各保一州,阻山依水,有急相救,此小国之利也。”

除此之外,曹氏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汉室代表性。其迎奉当时的落难天子重尊于庙堂,救皇室于存亡之间,前期确实有扶汉功勋。比如陈寿在称赞鲁肃时就曾提及:“曹公乘汉相之资,挟天子而扫群桀,新荡荆城,仗威东夏,于时议者莫不疑贰。周瑜、鲁肃建独断之明,出众人之表,实奇才也。”(《三国志·吴书·鲁肃传》)

最初,荀彧、毛玠等人为曹操提及的战略也是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,不臣是谁?在各自自诩正统的曹刘眼里,能达成一致的也就是孙权等割据军阀了。

所以,张昭所说的投降,面儿上也是老生常谈的“降汉不降曹”。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(208年),而曹操在数年前就曾有此心,要求孙权送质子以表忠心。在《江表传》中有这样一则记载:“曹公新破袁绍,兵威日盛,建安七年,下书责权质任子。权召群臣会议,张昭、秦松等犹豫不能决,权意不欲遣质,乃独将瑜诣母前定义,……将军韬勇抗威,以待天命,何送质之有!”……遂不送质。”

可见,当时的周瑜和张昭等人的立场与赤壁一役前十分相似:周

瑜主战,而张昭则摇摆不定。

周瑜、鲁肃等认为“汉室不可复兴,曹操不可卒除”,鲁肃为孙权计:“惟有鼎足江东,以观天下之衅。规模如此,亦自无嫌。何者?北方诚多务也。因其多务,剿除黄祖,进伐刘表,竟长江所极,据而有之,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,此高帝之业也。”

这与诸葛亮为刘备所筹谋的实在近似:“跨有荆、益,保其岩阻,西和诸戎,南抚夷越,外结好孙权,内修政理;天下有变,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,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?”

但因刘备是汉室宗亲,多了一道正统的血缘,无形中便少受了许多气。如孙权称帝前,曾主动向曹魏示弱称臣,受封“大魏吴王”,就被东吴诸将领看作是奇耻大辱。有趣的是,反而是此时主降的张昭在曹魏使者面前为东吴赢下三分薄面,颇具风骨地要求使者下车步行。

“魏黄初二年,遣使者邢贞拜权为吴王。贞入门,不下车。昭谓贞曰:‘夫礼无不受,故法无不行。而君敢自尊大,岂以江南寡弱,无方寸之刃故乎!’贞即遽下车。”(《三国志·吴书·张昭传》)

而当面对曹操气势汹汹的熊虎之师,统一北方的赫赫威名驾临江表,张昭等人的心绪不可谓不慌乱。在投降派看来,这一仗的胜算实在太小。难道江东比河北还要固若金汤?根基未稳的孙权会比四世三公的袁绍更堪为乱世雄主吗?我们如今偏安江南,名分如何定义?是预待交还江山的汉室孤忠,还是伺机而动的乱臣贼子?

而年少的孙权在面对风雨飘摇的汉室、父兄留下的基业和一群老臣的惶惶不可终日时,毅然做出了劈砍桌角与之决战的英烈举动。《江表传》:“权拔刀斫前奏案曰: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,与此案同!”

所以,在一切都是未知数的凶险境况下,被嘲弄为“江东鼠辈”的孙权并非没有血性,只是因此备受争议的“投降派”张昭也确有一些委屈可作商榷。比如元朝郝经就曾认为,张昭的行为是顾全大局:“其劝权迎操,志存汉室,以王道为度,

初不事夫偏霸也,此昭之所以为,昭岂浅浅功利之徒所能识哉?”(《续后汉书》)

曾多次硬刚孙权

赤壁一役后,三分之势初现。有趣的是,张昭在东吴的地位仍然居高不下,却始终与孙权处在将战将和的关系里。

张昭早年曾受孙策器重:“孙策创业,命昭为长史,抚军中郎将,升堂拜母,如比肩之旧,文武之事,一以委昭。”

他在东吴政权草创初期便颇有名望,甚至不少北方士大夫都写信“追星”:“今景兴在此,足下与子布在彼,所谓小巫见大巫,神气尽矣。”(陈琳《答张弦书》)搞得张昭左右为难,不好意思拿给孙策看,担心孙策会误会。而豪爽宽和的孙策却毫不顾忌,与张昭终无嫌隙。孙策去世前,还特地将孙权托付于张昭,张昭以臣首身份辅政,与孙权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君臣关系。

面对父兄的接连离去,孙权因悲痛未能正常理政,是张昭开解且亲自扶他上马视事,为其立信。“夫为人后者,贵能负荷先轨,克昌堂构,以成勋业也。方今天下鼎沸,群盗满山,孝廉何得寝伏哀戚,肆匹夫之情哉?乃身自扶权上马,陈兵而出,然后众心知有所归。”

孙权初即位时,张昭会干涉他喜欢的狩猎射虎举动,理由是他身为君主,不能因此出意外。“权每田猎,常乘马射虎,虎常突前攀持马鞍。昭变色而前曰:‘将军何有当尔?夫为人君者,谓能驾驭英雄,驱使群贤,岂谓驰逐于原野,校勇于猛兽者乎?如有一旦之患,奈天下笑何?’

对此,孙权积极认错,但绝不改正。

权谢昭曰:“年少虑事不远,以此惭君。”然犹不能已,乃作射虎车,为方目,间不置盖,一人为御,自于中射之。时有逸群之兽,辄复犯车,而权每手击以为乐。昭虽谏争,常笑而不答。

张昭为人“辞气壮厉,义形于色”,常常拿出忠臣长辈的姿态劝谏孙权,也不畏惧拂了他的兴头,曾在筵席上因孙权洒酒愤而离席,

将他比作纣王。

“权于武昌,临钓台,饮酒大醉。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:‘今日酣饮,惟醉堕台中,乃当止耳。’昭正色不言,出外车中坐。权遣人呼昭还,谓曰:‘为共作乐耳,公何为怒乎?’昭对曰:‘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,当时亦以为乐,不以为恶也。’权默然,有惭色,遂罢酒。”

而在立宰相时,面对众望所归的张昭,孙权仍然不许,以张昭“此公性刚,所言不从,怨咎将兴”为由将其逐出候选名单。

孙权称尊号后,张昭“更拜辅吴将军,班亚三司,改封娄侯,食邑万户”。这也正是南京张昭墓出土金印文字的史料出处。

张昭的脾气秉性让孙权有时深恨,有时依赖,有时又因此疏远他。比如二人一次拌嘴,孙权大怒之下提刀说出了让张昭十分伤心的话:“吴国士人入官则拜孤,出官则拜君,孤之敬君,亦为至矣,而数于众中折孤,孤尝恐失计。”

大概意思是说,吴国的臣子虽然入官拜他,出官却又去拜张昭,张昭的地位何其之高,孙权也对他极为尊敬,他却多次折辱孙权,让孙权不由得害怕自己哪天错了主意。张昭忤逆孙权的事也确实有过记载:“昭每朝见,辞气壮厉,义形于色,曾以直言逆旨,中不进见。”

而张昭对此直称“竭忠”,回忆起当年的托孤,“诚以太后崩,呼老臣于床下,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”,然后“涕泗横流”。孙权听罢,只好“掷刀致地,与昭对泣”。

但对泣归对泣,泣罢,孙权依然没有听张昭的话。张昭非常生气,称病不朝,于是孙权也生起气,用上将张昭的家门封起来,张昭不但不自救,还自己又在门内封了一层。君臣赌气之间,孙权发现张昭的劝告是正确的,悔不当初,于是亲自上门见他。张昭却不肯就见,孙权命人放火,张昭仍然不肯出来,到头来,孙权只得自己灭了火,但仍然久久伫立在门前不肯走。最终,张昭的儿子们一起扶着父亲,和孙权同载回宫。孙权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,张昭便也重新开始参与朝会。

张昭的脾性对孙权是负累,也是武器。有一次蜀国使者前来,在一众东吴臣子面前大肆美言自夸,满座群臣无人能对,孙权不由得想念起张昭的一张利嘴,次日,就请来张昭叙情。

“后蜀使来,称蜀德美,而群臣莫拒,权叹曰:‘使张公在坐,彼不折则废,安复自夸乎?’明日,遣中使劳问,因请见昭。昭避席谢,权跪止之。”

嘉禾五年(236年),八十一岁的张昭与世长辞。去世前,他要求丧事一切从简,不必铺张。

故事回归到现在,张昭的墓室印证了《三国志》中的薄葬规制,证明张昭的俭朴并非虚名,张昭的功名真实具体。这位身处传奇时代,刚烈板正又不失可爱的名臣,透过史料、文物与历代名人评价,再一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。

据“国家人文历史”公众号